

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 与中华民族复兴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C组 ——

目录

孙中山年岁考	王文隆/1
逝世后的孙中山与上海 (1925-1949)	徐 涛/12
国民革命前期孙中山与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认识及其影响	朱 英/28
孙中山与邮票	
——一则国家认同的样本研究	梁文生/47
风物长宜放眼量	
——孙中山实业思想再认识	马 敏/68
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	黎志刚/88
孙中山乡村治理的生态理念及其价值	王业兴/100
孙中山“足民食”惠农战略观探微	徐 田/113
铁路与国家权益:	
孙中山思想再认识	陈争平 郝志景/124
严复与孙中山, 思想家与实行家为什么没有合作?	郝晏荣/136
蓝天蔚与辛亥革命	蓝薇薇/147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李吉奎/165
孙中山、伍廷芳关系述论	李学智/181
杨鹤龄的早期经历及与孙中山的交往	
——兼论港澳粤籍人士对“革命”的反应	漆德红/199
孙中山与越南革命志士	阮秋红/218
孙中山早年好友沈翔云回国参加过自立军起义	曾业英/236
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探问	
——以策源地“特质”为中心	王 杰/248
“革命策源地”传统的发明:	
以纪念日为中心的考察	杨 林/281
美琳妹妹: 孙中山与青春少女宋美龄	邵铭煌/293
为国家的和平统一殚精竭虑	
——评孙中山与黎元洪的晚年	萧致治/319
疾病、身体与政治	
——孙中山确诊癌症及其治疗过程研究	姚 霏 郑珠玲/331

杨鹤龄的早期经历及与孙中山的交往

——兼论港澳粤籍人士对“革命”的反应

漆德红

摘要：翠亨杨氏借助重建家族历史、编纂家谱、建祠堂等形式来宣示族群的合理性，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家族历史中，在鸦片战争中致富后捐纳官衔，以获得国家认同和官方认可，后又通过澳门因素达到社会地位的上升。翠亨杨氏的崛起是广东沿海地区宗族群体社会流动的普通事例。通过杨鹤龄、孙中山与港澳人士的交往，可窥视广东民众对孙中山“造反”言论的立场以及面对社会变革做出的反应。

关键词：杨鹤龄；孙中山；四大寇；港澳粤籍人士。

杨鹤龄（1868-1934），名仕年，字礼遐，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1868年生于澳门，1885年广州算学馆肄业。早年常与孙中山交往，在香港与孙中山、陈少白、尤列纵谈国事，鼓吹反清革命言论，称“四大寇”。1895年加入兴中会，在兴中会早期会员中，和孙中山、陆皓东、杨心如并称“翠亨四杰”。本文拟探询孙中山“初期之友好及同志”与“四大寇”之一杨鹤龄的关系，以杨鹤龄家族的经历和事迹为个案，论述广东沿海地区传统社会中底层民众依靠体制外的因素以获得社会地位的上升，了解港澳广东民众对孙中山“造反”言论的立场以及面对社会变革做出的反应。

一、家世与家境

翠亨旧称“蔡坑”，最早见于地方志的记载是清乾隆《香山县志》卷一《坊都》篇，它是一个多姓氏聚居的村落，主要姓氏包括杨、陆、冯、孙、陈、何、麦、苏、梁等。据《申报》载：“翠亨村杂杨、陆、孙、陈、冯五姓血居，姓氏

虽别，亲睦则一，户口约二百家，风俗诚朴。”¹另据文献及口述史料，杨氏定居翠亨最早可追溯到隔田杨起茂于清朝康熙年间率亲族迁入始。

杨鹤龄的祖父杨达勋（1774-1848），名廷英，字达勋，号兼善，“道光二十二年由俊秀报捐从九品敕授登仕佐郎候选巡政司，……于咸丰九年间晋封中议大夫”，²是杨氏在翠亨定居后最早捐得功名的族人之一。翠亨杨氏在杨达勋与其胞弟杨兆勋的努力下，召集族人，为其父杨寅庵（1741-1809）建造祠堂，是为寅庵公祠。不久，杨家兄弟二人又携带旧存家谱往香山县石岐南关杨族认识宗亲，并在南关杨族处抄回始祖元规公历传世次，搜集乡野父老所述，重建家族历史，编纂翠亨杨氏第一部系统的家谱。翠亨杨氏通过建宗祠、认宗亲、编家谱，建立了一个基于血缘继嗣关系的群体，通过宗族整合、根据正统文化规范成为地方大族，并在鸦片战争后乘势崛起。

翠亨村庙北极殿建于清康熙年间，是村民共同祭祀和议事的公共机构，它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光绪三次重修，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有三次重修北极殿碑记，是了解翠亨村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亦是了解翠亨杨氏在村中历史地位变迁的重要见证。道光八年（1828）北极殿第一次重修，刻有《重修翠亨村祖庙碑记》，完整记录了此次修缮的情况。根据碑记，此次重修执事由杨达勋、陆爵车、冯辑鹏、孙德担任，捐款的有杨、陆、冯、孙、麦、刘、苏、谭、何、甘、梁 11 个姓氏，捐款人数和金额最多的为杨、陆、冯、孙四姓。该时期陆姓在村中经济实力应最为雄厚，因陆厚车一人捐银五十二两，而另一大族杨姓列名捐款的 23 人捐银总和大不如陆姓人。咸丰六年（1856），北极殿重修，亦留下了《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此次担任值理的为孙尊贤、杨业勋、陆达聪、冯辑照，村中仍然维持四大族的格局，杨族名列碑记里的捐款人数约 59 人，占全部捐款人数的 48%，共计捐银五百三十多两，占捐款总额的一半以上。杨达勋的三个儿子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分别“助工金银壹百大员”，占全村捐银总和的三分之一。据闻，这杨氏三兄弟是以在粤东汕头一代“卖猪仔”出洋而暴富，并且都捐纳了官衔。³

有清一代，通过捐纳得到官衔的人比比皆是，香山籍买办、实业家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人都是致富后在朝廷里捐了官衔，由此彰显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翠亨杨氏也不例外，杨鹤龄的父亲杨启操（1828-1885，名显光，号耀堂）

1 小谷：《中山先生之故乡小记》，1928 年 8 月 11 日《申报》第 17 版。

2 翠亨《杨氏家谱》，第 25 页，1933 年重修。

3 相关研究可参见黄健敏：《翠亨村》，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

就捐纳为“诰授朝议大夫”。¹关于杨启操的生意，除了坊间流传的“卖猪仔”²，他在港澳是有产业的，香港歌赋街8号杨耀记（“四大寇”常聚会的地方）就是他开办的商店，据说他还在港澳两地开办金山庄³，是一名成功商人。

许多有关杨鹤龄的革命史料言及其父杨启操的职业是经商，具体从事何种行业语焉不详。若翠亨乡人有关杨启操三兄弟“卖猪仔”的传言可信，杨启操等人在汕头一代从事苦力贸易暴富后，极有可能将该生意转移到澳门去。19世纪中叶以来，翠亨乡人常常到香港、澳门谋生，而通过这两个港口出洋的就更多。澳门葡萄牙人很早就开始经营苦力贸易（即“卖猪仔”），1851年，澳门兴起了有组织的华工输出贸易，1866-1873年间其苦力贸易达到顶峰。有文献记载：“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塘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⁴苦力贸易期间，澳门的人口贩子人数众多，1871年设立了24间“苦力贸易行”，其中一间名为“卡尔内罗”的贸易行就安排了1754名人贩子为其效力。⁵据不完全统计，从1847-1874年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十四万和十二万华工，大多数经由澳门运出。⁶林广志研究发现，由于苦力贸易带有严重的“原罪”性，许多参与其事，甚至以此发家的澳门华商对此莫不讳莫如深，但是，他从许多史料中找到了线索，一些华商依靠苦力贸易发家致富，掘得了商业上的第一桶金，并为进入苦力贸易式微后兴起的博彩业打下了基础。1873年前后，澳门有95家猪仔馆，从占多数的中式名号来看，亦可证明华商参与并主导了澳门的苦力贸易。⁷从名号上来看，这95家猪仔馆似乎都与杨启操兄弟没有关系，但是面对苦力贸易这样“本微力大”的“营生”，想必对早年赴澳经商的杨氏兄弟来说还是具有吸引力，而杨启操兄弟后来通过在港澳开办商店、金山庄等形式洗白财富，绝非不可能。

1 翠亨《杨氏家谱》，第31页。

2 根据李伯新1959年采访翠亨83岁老人陆天祥，说杨家三兄弟因在汕头一代贩卖“猪仔”暴富而被清朝官兵查抄。载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6年），第61页。

3 关肇硕：《香港西医书院时代的国父与关、杨两家族》，《香港开埠与关家》，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4页。

4 [清]李钟任，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年。

5 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第212页。

6 陈瀚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册，前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

7 林广志：《晚晴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81-83页。

杨鹤龄 1868 年 7 月 31 日在澳门出生。¹他的母亲侯氏为杨启操第四位夫人，是香山侯星桥次女，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比杨启操小 21 岁，常年居住在澳门。侯氏与杨启操生有四子四女，杨鹤龄是他们的长子，二女儿嫁予北岭吴节薇，而他们最小的女儿杨舜华于 1884 年出生，后嫁给关心民（即关景星）。²

在杨启操与侯氏的小女儿杨舜华出生的第二年，即 1885 年冬天，杨启操逝世，他的儿子们应该进行了一次分家析产的家事活动，杨鹤龄之子杨国铨曾说“十八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我父一大批产业”³。清代一般商人的经营方式与财富积累采取的多是“子承父业”的家族式发展模式，其经营与管理存在弊端，一旦经营失败或者经营者有所变化，资产即被迅速瓜分，生意很快就衰败下去。虽然家大业大，杨启操逝世后，其下一代并没有特别具有经商天赋或才能的人出现，其后人应逐渐淡出商界，财富大为缩水，也许不再为乡人津津乐道，这从光绪二十年（1896）北极殿重修的捐款名单中可以看出端倪⁴。此次重修担任执理的是杨启操胞兄杨启文等人，杨启文本及其三位夫人、十个儿子名义共捐款一千四百多元，占全村捐款总额的 70% 以上，杨启操的十一个儿子中仅有五子杨礼彤“捐银壹中员”，几为捐款金额中较少者。重修北极殿是翠亨村的头等大事，不管坚守故里的山野村夫，还是港澳经商的村民，甚至远在檀香山的华侨，大家都没有错过这一盛事，他们清楚地知道，捐款的多少不但是彰显财富、社会地位的标志，更是延续后世、扬名村史的绝好时机，如果此时杨启操的儿孙们依然风光无限，想必不会避开。

杨启操兄弟在翠亨村置有田产，建有大屋，杨启操的祖屋后被拆除，而翠亨村现存的杨氏祖屋中，以杨启文“杨四宅”最为豪华。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三兄弟曾在翠亨村合建一座名为“韵园”的花园，今遗址尚存。杨氏兄弟还在村里建了祠堂，即杨兼善祠，为兼善房族人的祠堂，现屋顶虽已倒塌，“骨架”仍在，部分建筑细部保存完好。⁵翠亨杨氏自清康熙年间迁入，到杨达勋、杨业勋兄弟建宗祠、认宗亲、编家谱，在鸦片战争后逐渐崛起，到杨启文、杨启操、杨

1 翠亨《杨氏家谱》，第 47 页；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革命逸史》（初集），第 8 页；李志刚：《从四大寇的订交探析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辛亥革命与香港基督教》，第 61 页。

2 翠亨《杨氏家谱》，第 31-32 页。

3 杨国铨：《回忆父亲杨鹤龄》，《香港开埠与关家》，第 59 页。

4 《四修翠亨祖庙碑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5 黄健敏：《翠亨村》，第 73 页。

启怀等人赴港澳经商，财富的原始积累已远远超越父辈，使得杨氏一跃成为翠亨第一大族。

二、学业、职业与“四大寇”订交

目前传世的有关杨鹤龄的史料，无法得知 1882 年前杨鹤龄的行踪，只能根据现有资料知悉他出生并居住在澳门，常来往于父亲在香港开设的商店，偶尔回故乡翠亨小住。他童年时在哪里上学，究竟有无上过私塾，或者是否入读港澳新式学校¹，无从知晓。

一说杨鹤龄早年“曾从简朝亮（竹居）先生治国学”²。简朝亮（1851-1933），字季纪，号竹居，广东顺德简岸乡人。“自其祖旅居南海县佛山镇，咸丰元年先生于此诞生。……年十九，为童蒙师。年二十一，进县学。年二十四，受学于朱次琦，凡三年。……年二十九，设馆广州六榕寺。”³简朝亮早年与康有为同为名儒朱九江（次琦）门下求学，是清末民初岭南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著有《朱先生讲学记》、《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等书。按简朝亮 1851 年出生，29 岁（1880 年）在广州六榕寺开馆授学，时年杨鹤龄 12 岁，慕名从港澳到广州求学，或有可能。此时杨鹤龄跟随业师“治国学”，所读何书？有学者曾做过调查，认为明清至民初，私塾入蒙之课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小册子，唯各私塾须加额外读物，有关文学者有《千家诗》、《古唐诗合解》、《古文观止》等书，有关历史者有《鉴略妥注》、《五言韵文》等，有关为人处世做文章者则有《幼学琼林故事》、《龙文鞭影》等，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等。⁴按杨鹤龄的年纪，或许不用再修入门的小册子，听取业师讲授四书、五经这些儒学经典也是可能的。

杨鹤龄入简门多久不清楚，自 1882 年，14 岁的杨鹤龄被父亲杨启操送到广

1 杨国铿在《回忆父亲杨鹤龄》开篇提到其父杨鹤龄“随祖父（杨启操）在港澳读书”，皆不言上得是何种学校。参见《香港开埠与关家》，第 56 页。

2 陈春生：《杨鹤龄之四寇堂》，《经纬》1945 年第 3 卷第 1 期。

3 容媛编：《悼柯劭忞简朝亮先生》，《燕京学报》1933 年第 14 期。

4 佚名：《孙中山先生与其传统文化素养》，未刊稿，第 3 页，转引自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4 月版，第 139 页。

州算学馆¹学习,“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²。前人诸多研究皆言杨鹤龄与尤列是同学,有同窗之谊,或有不妥。据冯自由载,尤列1885年“腊末求学于广州之算学馆,留馆三年”,1888年冬毕业后,“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翌年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³若按广州算学馆是三年学制,杨鹤龄1882年入学,1885年应该毕业,即尤列入学时杨鹤龄已毕业,杨、尤二人算是校友。1889年的某一天,尤列“至歌赋街杨耀记商号,访算学馆学友杨鹤龄”,⁴此处冯自由称二人是“学友”,或可信。

如果以上杨鹤龄求学轨迹正确的话,杨启操希望儿子杨鹤龄读书仕进的可能性极大:让年幼的杨鹤龄接受西式教育,稍长将其投入岭南大儒门下接受传统的经学、经典训练,接着又将其送到算学馆,学习科学技术,虽在港澳经商、居住多年,我想杨启操的初心,大抵还是希望其子以洋务人才身份在清朝任官,而非培养自己生意上的接班人。

杨鹤龄自1885年广州算学馆毕业后,可能进入广东舆图局工作,因冯自由在叙述尤列事迹时曾说“杨鹤龄亦舆图局学生”⁵,杨、尤不但是算学馆的校友,而且先后都在广东舆图局工作,相识后二人话题投机,应颇能聊。不幸的是,这一年冬月初一,杨启操逝世,杨家应该经历了一场分家析产的斗争,杨鹤龄继承了父亲的一大批产业,辞去广东舆图局的职务,子承父业,回到香港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商店等生意。

关于杨鹤龄如何结识孙中山,说法不一。杨国铨回忆:其父与孙中山、陆皓东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聚不远,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孩童时代常听到人们讲述太平天国洪杨革命故事;1886年孙中山入读广州博济医院,

1 算学馆是我国古代培养天文、数学人才的学校。由于西学东渐,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天文算学对社会的影响,“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页),遂于清同治五年(1866)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学习西方行军造船之长技、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探求中国自强之道。(顾卫星、杨才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争论之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7卷第2期)

2 杨国铨:《回忆父亲杨鹤龄》,《香港开埠与关家》,第56页。

3 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30页。

4 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初集),第30页。

5 冯自由:《尤列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26页。

与杨鹤龄久别重逢，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¹据翠亨村民回忆，杨鹤龄很少回乡，他虽与孙中山是同乡，却是后来孙中山就读香港中央书院时经由同乡、同学谭虚谷介绍才熟悉的。²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读书时，闲暇之余尝不分教师学生、商贾、工人，与他们谈论国事及救亡之策，他不问对方是否赞成或了解，都侃侃而谈，许多人对他的言论一笑置之，只有同学郑士良对于他的言说热心倾听，甚加赞佩。³孙中山曾说：“当余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仗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⁴若此时孙中山与杨鹤龄已经相熟，二人又非常投缘，必引为知己，但孙中山本人却未提到他与杨鹤龄的私交如何的好，倒是后来论及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鼓吹革命时，与杨鹤龄等人相与往还。孙中山13岁即赴檀香山，直到1883年返乡，此后分别在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西医书院就读，他与杨鹤龄或许已在幼时相识，由于他们当时家境相去甚远，一个是下户人家的农家子，一个是常年在澳居住见多识广、“喜戏谑”的富家子，他们有无共同话题可想而知。经过多年的知识储备，当口才极佳的孙中山再次与杨鹤龄相遇，瞬间就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孙中山曾忆述与“四大寇”的结交：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馀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无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理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1 杨国铿：《回忆父亲杨鹤龄》，《香港开埠与关家》，第56页。

2 黄健敏：《翠亨村》，第224页。

3 《总理年谱长编稿钞本》，第10页，转引自《国父年谱》（增订本），第46页。

4 孙中山：《建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¹

先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尤列²。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出身基督教家庭，其父陈子桥为广东基督教界名人，曾参与美国长老会格致书院的创办，陈少白1888年入读该书院，稍后在其父好友、广州伦敦传道会传道区凤墀介绍下到香港，并经由王煜初牧师（1843-1903，广东东莞人）得识孙中山。³此后，孙中山与陈少白来往频繁，关系甚密。他常常劝陈少白学医，在其介绍之下，陈于1890年1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并以Chan Man Shiu之名注册。

4

杨鹤龄是基督徒，其葬礼是以基督教仪式进行。据说杨鹤龄逝世后，各基督教徒及党部同志纷纷前往吊唁，1934年9月4日出殡时，在其寓所水坑尾斜巷即青砖巷十四号举行宗教祈祷礼。⁵杨家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杨鹤龄的妹妹杨舜华嫁给关景星，香港关家是有名的基督教世家，关、杨两家关系密切。⁶杨鹤龄生母侯氏卒于民国五年（1916）二月廿九日，葬于澳门西洋坟场（St. Michael Cemetery）。⁷笔者在西洋坟场见到侯氏之墓，麻石墓碑上赫然可见十字架、侯氏像，刻着“中山县翠亨乡二十世祖杨耀堂公之侧室杨母侯氏太夫人之墓”等字样，由此可知侯氏亦信教。

1887年孙中山转学香港西医书院，至10月3日开始上课，直至1892年7月23日毕业，在该校共度过五年习医生涯。⁸1888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课余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在“杨耀记”后楼相聚，高谈造反覆满，被称为“四大寇”。⁹陈少白忆述：“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2 孙、尤相识经过可参见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革命逸史》（初集），第8-9页。

3 李金强：《孙中山与香港——四大寇结交考述》，“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论坛交流材料，2011年6月18日；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先生哀思录》，第93页。

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先生哀思录》，第94页；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第34页，第151页注46。

5 陈春生：《杨鹤龄》，《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167页。

6 关肇硕：《香港西医书院时代的国父与关、杨两家》，《香港开埠与关家》，第53-55页。

7 翠亨《杨氏家谱》，第31页。

8 李金强：《再论孙中山的大学时代1887-1892》，《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8-156页。

9 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革命逸史》（初集），第8-9页；李金强：《孙中山与香港——

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¹

杨国铿在《回忆父亲杨鹤龄》一文中提及“四大寇”是“金兰兄弟”，²冼江《中华民国与四大寇》一文记载了四人结拜的经过：“尤列一向是很尊重逸仙之意见，于是提出联合宣誓，以示坚决。逸仙首先赞成，少白、鹤龄亦同意，并决定即日举行”，于是，在1888年10月10日，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在杨耀记天台共同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同心，复国是从”。³先后有两年之久，是以孙中山与陈少白有同门之谊，亦见四大寇是广州算学馆和香港西医书院两组同学的结合，⁴且孙、陈、杨还有教友之谊，“四大寇”的订交当有地缘、学缘、教缘等多种关系。

杨耀记为杨启操在香港开办的商店，经营何种商品尚不清楚，“四大寇”在此畅谈革命时，杨启操早已仙逝，杨耀记可能为杨鹤龄继承自父亲的产业，方能容留充满“造反”言论之孙中山等人。由于杨鹤龄在杨耀记“店内独辟一楼作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孙中山到港常下榻其间，⁵孙、杨二人情谊与日俱增，有记载云：杨鹤龄“少年时，与总理（孙中山）等不时高谈革命，当时尚未话到民主共和，故同学众人戏呼之为左班丞相，意谓总理若为皇帝，彼为总理最投契者，必以左班丞相之最高位置之也。彼排行第四，故同学戏呼之为杨四郎。”⁶据冯自由所记，“四大寇”常在杨耀记聚谈，“同志郑士良、陆皓东等来往广州、上海过港时，亦常下榻其间，故该店可称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⁷

据尤列所说，他曾告知杨衢云，到香港与孙中山同居于杨耀记，并谓杨耀记至今已无存，其门牌号数待考。⁸1946年，罗香林考查孙中山在香港史迹，到歌

四大寇结交考述》，“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论坛交流材料，2011年6月18日。

1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83页。

2 杨国铿：《回忆父亲杨鹤龄》，《香港开埠与关家》，第57页。

3 冼江：《中华民国与四大寇》，尤嘉博：《尤列集》，香港：美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17页。

4 李志刚：《从四大寇的订交探析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李志刚主编：《辛亥革命与香港基督教》，第62页。

5 参见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革命逸史》（初集），第8页。

6 陈春生：《杨鹤龄之四寇堂》，《经纬》1945年第3卷第1期，第7页。

7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8 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第65页；尤列：《杨衢云略史》，尤嘉博：《尤列集》，香港：美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26-227页；参见李金强：《孙中山与香港——四大寇结交

赋街时获当地街坊告知，谓杨耀记坐落在歌赋街8号，已改为“永德生记印务店”，为三层楼宇，向西隔十余间店铺就是善庆街，街西隔铺二间即为孙中山曾就读的中央书院；再由歌赋街8号向东即为鸭巴甸街，沿街南向上行，可达荷里活道，向左转两条街相交之处就位西医书院所在地。¹由此可见，西医书院与杨耀记相距不远，在此就读的孙中山、陈少白二人方便前往，与杨鹤龄、尤列相聚，高谈阔论，“杨耀记即以四大寇之聚会所，而成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之原生地”²。

三、孙中山、杨鹤龄与港澳粤籍人士的交往及对“革命”的反应

香港、澳门是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著名对外贸易港口，因“夷风染习”，成为中西文化传播汇集之地。翠亨村民到港澳谋生的不少，而通过这两个港口出洋的就更多，港澳是当地人的外向门户和了解世界的窗口，翠亨村东南侧的村道是从香山县城石岐到澳门的主要道路之一。孙中山在香港求学多年，不但获得专业知识，还在此萌生“革命”思想，所谓“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³，据其自述，港澳及翠亨村对他生活和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⁴；杨鹤龄是土生土长的翠亨澳门人，常年往来香港，幼时在港澳接受教育，他与孙中山早期交往多集中在港澳两地，而孙中山早年能结识澳门华商，并获得他们的资助在澳行医，倚靠的部分人脉关系可能来自杨鹤龄。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兼室友关景良（1869-1945）与“四大寇”关系友好，乃目前传世的“四大寇”合影中站立一旁之人。关景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年就读于拔萃书室，后来入读西医书院，与孙中山同窗。关景良的祖父关允著（1797-1863）自香港开埠便携家人到港经营银业，他的父亲关元昌

（1832-1912）据说是第一个华人注册牙医，有“中华牙医鼻祖”之称，热心伦敦传道会会务，曾参与筹建道济会堂，该堂于1888年落成，是热心的基督徒；他的母亲黎氏（1840-1902）是西医书院护士长和英文翻译，亦为基督徒。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与关景良住同一宿舍，在功课上遇到疑难时尝向黎氏请教。

考述》，“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论坛交流材料，2011年6月18日。

1 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重印，第24-25页。

2 李金强：《孙中山与香港——四大寇结交考述》，“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论坛交流材料，2011年6月18日。

3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4 可参见[美]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孙逸仙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

据闻黎氏常邀孙中山到家中与几辈们共食。

香港关家是基督教家族，与杨鹤龄、孙中山关系密切。关景良之妻李月娥（1876-1905），其父是孙中山之兄孙眉在檀香山的邻居李康平，与孙家相熟，故李月娥经孙中山介绍给关景良相识，且为二人结婚之见证人。关景星之妻杨舜华则为杨鹤龄之妹。² 关元昌之五女婿温秉忠（1863-1938），原籍广东台山，是牧师温清溪之子，为1873年第二届留美幼童，他的元配关月屏逝后，他的续弦夫人出自上海倪家，倪家小姐是徐光启的后裔，温秉忠与宋耀如是连襟，使得香港关家不仅与天主教的上海徐光启家族有了联系，还与海南的宋耀如家族有了婚姻网络的连结。³ 经温秉忠做媒，关元昌之八女关月英（1870-1962）与香山南屏容星桥于1891年结婚，香山容家与香港关家有了姻亲关系。孙中山出席了这次婚礼，据说他为了要向来宾展示关月英的天足，故意在其身后燃放爆竹把她吓得跳起来。⁴ 容星桥是容闳（1828-1912）的堂弟，1874年被选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他与温秉忠同时寄宿在美国麻省Northampton的Martha Ely Matthews小姐家。⁵ 容星桥通过关家结识孙中山，于1895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1899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兴汉会的湘汉负责人，参加1900年汉口的自立军起义计划，事败后与在上海的孙中山、容闳等人会合前往日本东京，后曾在香港经商，任《中国日报》印刷事务经理，并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与基督徒的交往由来已久，他在拔萃书室读书期间，结识美国传教士喜嘉理（Rev. C. R. Hager, 1840-1917），受其极力劝说，偕好友陆皓东同受洗礼于纲纪慎会礼拜堂，在受洗册上孙中山署名日新，陆皓东署名中桂，其施受洗礼者即为喜嘉理牧师。孙中山“日新”之号，原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经区凤墀改号“逸仙”。孙中山先后从学广州博济医院及香港雅丽士医院，皆用此名。⁶ 他在中央书院读书时，曾随传教士区凤墀习国学⁷。区

1 关肇硕、容应莢著：《香港开埠与关家》，第21页。

2 见关肇硕、容应莢著：《香港开埠与关家》，第16-17页。

3 查时杰：《辛亥革命时期前后的广东基督教家族》，《辛亥革命与香港基督教》，第147页。

4 关肇硕、容应莢著：《香港开埠与关家》，第17页。

5 容应莢：《孙中山与香港基督徒家庭》，第52页。

6 参见《孙总理信奉耶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2集）第10-11页。关于孙中山入基督教之时间，《孙中山年谱长编》根据《革命逸史》与喜嘉理的回忆，将孙中山入教的时间大约定为1883年年底；《国父年谱》（增订本）则定于1883年冬；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一书根据喜嘉理的文书，推测孙中山受洗的具体日期为1884年5月4日，见该书第56页。

7 关于孙中山与区凤墀的交往，一般根据《革命逸史》之说，谓孙中山就读香港中央书院时即延请区凤墀为其补习国学，然据区凤墀之婿尹文楷所撰《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一文称，1886年区凤墀于广州任传道时，经其任职广州博济医院的女婿尹文楷介绍，得与其时就读该校的孙中山相识，此即“先是外舅宣教历有年所，一见中山先生（时习于博济医局），即识为大器，尝戏之

凤墀(1847-1914),广东顺德人,伦敦传道会道济会堂长老,曾受聘德国柏林大学华文讲席,经其婿尹文楷(1870-1927,基督徒,任广州博济医院医务兼译医书)引荐与孙中山相识,孙中山常在夜间请他辅导国学,商谈机密,后农学会宣言,即出自区凤墀之手,大意为广招同志,改良农业,以挽救中国之贫弱,此文曾刊登在1895年广州《中西日报》上。¹孙中山入读西医书院后,由区凤墀引荐与王煜初相识。²时王煜初牧师主理道济会堂,此后,孙于该堂聚会崇拜,聆听其讲道,来往密切,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相处有若同志。³自此,孙中山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友,他们在乙未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冯自由记载,兴中会成立前与孙中山密谋反清的粤籍15人中,有8人是基督徒,⁴若算上杨鹤龄的话,约有9人。⁵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自西医书院毕业,他在香港并未谋到职业,于是转赴澳门行医。先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诊治,一药便瘳,惊为神奇。及先生毕业,曹、何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⁶同年9月,孙中山经由卢九、何穗田、曹子基、吴节薇等人引荐,被镜湖医院聘用,“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

曰:子虎头燕颌,终非池中物,中山先生亦礼敬外舅以师事之”。见《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第12页所引。

1 参见《区凤墀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12页;《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11页。

2 见尹文楷《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转引自李金强《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第52页。

3 见王宠惠《追忆国父述略》,《困学斋文存》第1页,转引自《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第52页。

4 冯自由:《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23页。

5 该数据仅根据冯自由的记载及本文的史料推断,其他材料涉及的人名未录。

6 参见《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第17页。据刘学询回忆,他于1892年结识孙中山,因胯下生疮,延请中医屡治不愈,经友人介绍至澳门镜湖医院诊视,并施手术,得以康复,始悉西医外科之能,并经何穗田介绍,得识刚从西医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彼此“连谈数夕”,“非常惬意”。刘学询遂宴请澳门绅商,募捐资助孙中山行医,出资1千两,并令名下商店10间,各捐1千两,合共1万1千两,其好友檀山归侨陈芳亦因而捐出1千两,合其余捐者共计3万余两。参见陈肇琪:《总理史实访问记》,转引自《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第32页;又见苑书义撰:《评鲜为人知的〈总理史实访问记〉—兼论孙中山与刘学询的关系》,《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页。

中医所不及，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竟破例从之”。¹卢九、何穗田、曹子基、吴节薇等人是澳门粤籍知名绅商，分别在1879、1881、1890、1893年担任镜湖医院总理，1892年前后均参与镜湖医院的管理工作，早前对孙中山的医术已有认识，他们可能一起或分别向镜湖医院绅董推荐了孙中山。²

1892年12月18日，孙中山特向镜湖医院借贷本银二千元，由吴节薇担保，在澳门设立中西药局；1893年7月25日、9月5日、9月12日，《镜海丛报》连续刊登了题为“神乎其技”的广告，盛赞孙中山的医术³；是年9月26日、10月7日，《镜海丛报》刊登了一则署名卢焯之、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题为“春满镜湖”的行医广告，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人品和医术⁴。

以上为孙中山早年在澳门挂牌行医的经过。当年孙中山不过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大学生，如何得识名声大震的粤籍华商曹、何、吴等人？

在翠亨《杨氏家谱》之“杨鹤龄”条下，记载着他的原配曹氏的信息：“妣曹氏上涌永秋公孙女，生于清同治九年庚午三月贰拾五日卯时，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四月贰拾九日未时，得年叁拾八岁，葬于前山，土名罗兜坑，坐西南向东北。”⁵杨国铿亦回忆杨鹤龄之原配出自澳门曹氏。据研究，香山上涌曹氏一族从第十一世开始赴澳门经营生计，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世共五代数十人都是居澳寻常居民，至第十七、十八世时人丁兴旺，一度成为澳门的大家望族之一。⁶

曹源彰（1808-1874），讳安，号永秋，广东香山上涌人。1834年至1857年一直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充当买办，后随英人迁至香港，依靠继续投资房地产及典当经营，退休后返澳去世。⁷据《澳门政府宪报》、《澳门编年史》等记载，曹源彰与曹有、曹应达等人参与镜湖医院的创建事宜，可见其经济实力雄厚。曹源彰曾帮助在香港经营杂货店的堂弟曹有发展生意，两人互相信任，交情至深，曹有将三子曹善业（子基）过继给他，1873年9月，曹源彰亦将全部产业交给

1 冯自由：《孙总理之医术》，《革命逸史》（初集），第9页。

2 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 《神乎其技》，*Echo Macaense*, Julho 25, 1893.

4 《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 Setembro 26, 1893.

5 翠亨《杨氏家谱》，第47页。

6 张建军：《澳门华商曹善业及其家族的再研究》，《澳门研究》第79期。

7 参见赵利锋：《孙中山先生在澳行医时期交友人物考——华商曹子基及其家族》，刘正刚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十七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曹有托管。¹曹源彰生有一女，未生有儿子，先后收养了曹广斯、曹有斯、曹善业、曹善麟。翠亨《杨氏家谱》言杨鹤龄之妻曹氏为“上涌永秋公孙女”，可能是曹永秋养子的女儿，但不会是曹善业的女儿²。澳门曹氏与镜湖医院千丝万缕的关系，亦为后来孙中山在澳行医提供了帮助。

澳门曹氏对孙中山早年行医及革命活动资助良多。孙中山中西药局的开创和经营，曹有不但协助他向镜湖医院“揭银”，亲自签名成为借款的“知见人”之一，还曾在资金上予以支持，有资料显示，曹有与孙中山围绕中西药局曾有金钱往来。据1896年9月21日曹有在香港高等法院立下的遗嘱，“将所有财产物业特分三股，如下所述分配……另股份及揭项永年息收者列下——……孙逸仙药局一百四十四两”，³该款项应为中西药局当年未归还的借款，仍被列为“揭项”挂账，并作为遗产分配。曹有的儿子曹善业“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药局行医”⁴，为“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为孙中山的医术所折服，与孙中山交往颇深。曹善业名下的物业也有两处已被发现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其中，位于“草堆街80号”的一处物业被认为是孙中山当年在澳门创办的“中西药局”的旧址，而“由义巷11号”的物业则已确认为当时兴中会澳门的通信联络点。曹有的另一儿子曹善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曾暗中相助。据曹克安称，“我父亲（曹善允）对于革命工作，暗助良多。（孙中山）在一八九七年抵达日本。同年陈少白先生，往日本参加在当处举行之兴中会会议。同年我父亲不知甚么缘故，也到日本一行”。⁵

吴节薇是杨鹤龄的妹夫⁶，他是孙中山借款开办中西药局的担保人，也是澳门镜湖医院的总理，孙中山在澳行医及开办药局多得其襄助。据杨鹤龄之子杨国铿回忆，杨鹤龄曾将位于澳门龙崇街的一所房子变卖给吴节薇，所得款项全数赠给孙中山。⁷

1 相关研究参见张建军：《澳门华商曹善业及其家族的再研究》，《澳门研究》第79期。

2 张建军考证了曹善业十五子十女的情况，依目前的资料，不符合杨鹤龄之妻曹氏的特征。参见张建军：《澳门华商曹善业及其家族的再研究》，《澳门研究》第79期。

3 镜湖医院慈善会：《纪念辛亥革命弘扬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2011年，第39页。

4 冯自由：《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第5页。

5 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 上文已提及，杨启操与侯氏的二女儿嫁给吴节薇，但此时吴、杨婚否尚不清楚。

7 《杨鹤龄与孙中山交往深——访杨鹤龄之独生子国铿》，《澳门日报》1981年10月9日。

何连旺(1855?-1931?),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原籍广东顺德,后加入葡萄牙籍。是著名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何氏家族参与博彩业,主要涉足闹姓、番摊专营权的竞投与承充;何穗田与其父对于盐业经营亦充满兴趣,先后多次竞投盐业专营权,并获得成功;19世纪80年代,何穗田还在澳门陆续投资经营实业,分别开设缫丝厂、炮竹厂等,他还经营时和银店。¹何穗田在澳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并对澳门经济、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还获得葡萄牙政府的褒奖,“在澳居住入西洋籍华人何连旺,着赏基利斯督宝星”²。卢华绍(1848-1907),字育诺,号焯之,人称卢九,广东新会人。早年到澳门从事钱银找换,“善营商业,雄财一方”³。卢九家族的生意主要集中在博彩业、猪肉生意、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及与人合作的一些实业等,其主营业务为博彩业,堪称晚清澳门的赌商世家,是晚清澳门最大的华人赌商。⁴迄今为止,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如何结识何、卢二人,也不清楚杨鹤龄在其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观镜湖医院征信录,其值理中并无“杨启操”,可见杨启操的地位及财力尚不足与何、卢等澳门华商相提并论,他与何、卢相熟的程度亦未可知。因此,孙中山与何、卢的结交,不能忽略孙中山的交际能力以及他与香山、澳门等地粤籍人士的密切交往。

孙中山读书期间往来港澳,直至到镜湖医院坐诊、开办中西药局,其主要结识、交往和资助者多为粤籍人士,除了结交基督教教友,他还与粤籍华商多有往来,如顺德籍的何穗田、新会籍的卢九以及香山籍的郑观应、曹有、曹善业、杨鹤龄、吴节薇、陈赓虞、陈席儒等,这些人中尝有被冯自由誉为兴中会初期孙中山的“友好及同志”。为何孙中山工作顺遂、年收入过万⁵,却在1893年⁶结束

1 林广志:《晚晴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第155-161页。

2 《澳门宪报》1884年9月20日第38号。

3 《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1949年铅印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4 相关研究参见林广志:《晚晴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第162-173页。

5 据陈少白言:“他(指孙中山)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先生哀思录》,第94页。

6 费成康根据中西药局最后一次刊登广告的日子,推断“孙中山离开澳门的时间当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前后”,因此,“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生涯长达一年多时间”。参见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5页。本文仍沿用旧说。

在澳行医？据他自述，是遭到澳门葡籍医生排挤，转至广州继续行医。¹冯自由则谓孙中山在澳结交多为绅商，欲物色热心同志而杳不可得，又遭葡籍医生排挤，“总理早认澳门一地不能为政治之活动，乃乘机收束中西药局而移于广州。”²澳门中西药局歇业后，孙中山将中西药局中所用的滤水器、药柜等物交杨鹤龄保管。1934年，杨鹤龄去世前嘱托国民党澳门支部将滤水器转赠给广州博物院（今广州博物馆）。³

求学期间，孙中山喜与同学谈反满，常对江英华说：“医生救人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吾欲反满，吾此生舍反满莫属矣！”⁴他与“四大寇”相聚“杨耀记”后楼，高谈造反覆满。在一次从香港到澳门的旅途上，他曾在“香山”轮船栏杆旁对陈少白说了一番话，“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⁵而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亦谓其“政治生涯”始于在澳行医：“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⁶

兹据以上所引，孙中山读书期间即充满“反满”、“造反”的热情，到卒业行医，这种热情不减反增，但尚未到真正“革命”的地步，陈少白曾说“实则纵谈之四大寇，而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⁷“四大寇”交往期间尚无“革命”口语，四人所谈者，均为反清造反之事，亦只相聚密谈，不能公开倡言，“戚友”等知之呼为四大寇，自为情理所有，若谓“时人”亦知之，是超出戚友范围之外，传之社会，虽在香港岂能逃避粤中官府侦察之耳目。⁸

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结识关景良一家，来往频繁，且受关母黎氏厚待，但黎氏并不赞成儿子参加革命党，她的儿子几乎全部都在接受西式教育之后，以洋务人才身份在清政府任官，和孙中山最要好的七男关景良“性孝，慈命难违”，为黎

1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页。

3 《孙中山业医时之滤水器》，《华星三日刊》1935年11月初九日，第3版。

4 参见郑子瑜：《郑子瑜诗文集》，第12页，转引自李金强《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第21页。

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先生哀思录》，第95页。

6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50页。

7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83页。

8 参见罗明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220-221页，引自《“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81-82页。

氏的反对而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据载：“太夫人黎氏，谙英文，在雅丽氏医院当通事，待人和蔼，有大众谊母之称，习闻孙（中山）总理革命言论，后见时来与孙、陈（少白）聚谈者，如尤少纨（列）、王孟琴、何兴简、杨鹤龄、杨迺安、杨衢云诸人，均以排满为己任，懼事不成而祸及也，约束先生（关景良）惟恐不谨。”²关景良从西医书院毕业后，曾在那打素医院(Nethersole Hospital)工作，1904年张之洞慕其医术精湛，礼聘他回国任江阴沿江炮台总医官，负责医务事宜凡四载，后仍回港从事医务工作。但是，关景良与孙中山及其他公开支持革命者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如1900年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暗杀，他的家人怕受牵连，而由关景良、王煜初、区凤墀等教会中人为其办理后事；当孙中山在国内发起多次起义时，1910年10月13日关景良在香港发起剪发不易服会，不但引起本地社会人士的注意，邻近地区亦有加以响应，从而掀起一个剪发不易服运动，与国内革命遥相呼应。³

孙中山到澳门后，拟“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乃以镜湖医院为中心，物色从事政治运动的“热心同志”，因该院皆为澳门有名的绅商所创立，“若从事政治运动，非先向该院绅商入手不可。”⁴据孙中山自述：“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⁵有葡国学者指出，孙中山“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生计，他决定开办肺病治疗所并在草堆街开设药局，这两个地方虽说是为病人服务的，但也是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尚不能证明孙中山已具明确的革命思想，且边行医边从事革命活动。⁶

孙中山结识的澳门华商何穗田、卢华绍、吴节薇等人，皆通过投资慈善事业（如镜湖医院）赢得华人社会的尊重，他们一面享受着澳门当局授予的荣誉和权柄，一面通过捐资、管理华人社会等方式为当局效力，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上提供帮助，并为稳定澳门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澳门以外的地区，他们与家乡广东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家族传统文化的渗透依然深厚，使得他们对清政府的功名心存敬慕。⁷何穗田在成名后以“何仲殷”之名出钱捐了广西候补道员，又盼

1 关肇硕、容应莢著：《香港开埠与关家》，第21页。

2 《关心焉医师》，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录》，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第97页。

3 周佳荣：《行道济世另一章：关景良与香港剪发不易服会》，《辛亥革命与香港基督教》，第231-244页。

4 冯自由：《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页。

5 孙中山：《建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6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1993年第17期，引自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7 相关研究可参见胡雪莲：《何廷光与〈知新报〉的诞生——兼及19世纪末年澳门华商的交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儿子读书考取功名，其第三子何云章 1894 年中了秀才，次年正月即被其安排回顺德原籍行谒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¹ 1889-1898 年是何穗田商业经营的上升与兴盛时期，此间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且襄助其行医，1896 年秋，当其与刚荣登新科进士、游历来澳的康有为熟识后即结为知己，“康有为亟须实现政治理想所需的财力，而何廷光渴慕康有为在广东乃至京城的政治影响力，两人一拍即合，议定开办《知新报》”²。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在澳门没有政治基础，倚靠的是何穗田等华商提供的政治保障，使得维新思想通过纸媒得以在澳门传播。因此，孙中山不得已于 1893 年转赴广州行医或可从中看出端倪。

四、小结

上揭杨鹤龄的家世，可看到清代珠江三角洲民田区内家族的繁衍与变迁。杨氏族人通过建宗祠、认宗亲、编家谱等方式确立大族的地位，致富后通过捐官的手段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是，传统中国改变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主要渠道仍然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广东沿海地区普通底层民众无力向子弟提供教育和参加科举的机会，凭借澳门的有利条件，产生了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流动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包含了传统中国社会里活动范围狭小的从劳工、经商者、留学者到女性等各个社会阶层，主要依靠体制外的因素达到社会地位的上升³。大致在 19 世纪中期及以后生活在澳门的杨启操，其生活轨迹正好印证了这种可能，虽然他不像卢九、何穗田那么耀眼，但他产生的趋新思想（比如将杨鹤龄送到算学馆）一定与澳门因素有关，杨鹤龄早期的求学、工作即是在其父的安排下按照体制外的教育进入到体制内的职业，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

早年孙中山、杨鹤龄的交往，除了深厚的同乡情谊，还夹杂着翩翩少年的不羁与叛逆，他们浸润在港澳趋新的社会环境与新式思想的土壤里，对传统体制不以为然，充满着“造反”、“反满”等思想。孙、杨二人亲密接触的香港关家、澳门华商何穗田、卢九等，他们都是祖籍广东沿海地区的人士，虽然营生、经商

1 《荣归谒祖》，《镜海从报》1895 年 2 月 13 日第 29 号，第 5 页。

2 胡雪莲：《何廷光与〈知新报〉的诞生——兼及 19 世纪末年澳门华商的交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 年第 2 期。

3 相关研究参见赵立彬：《社会流动与澳门对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辐射作用》，《学术研究》2010 年第 4 期。

在港澳，与家乡社会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家族文化影响仍然深刻，对科举、功名的渴慕与敬畏剪不断、理还乱，因此，在后来孙中山发动的反清革命运动中，早期交往的“友好同志”中极少有表示公开支持革命者（虽然在乙未广州起义中涌现出许多基督教友，他们掩护并护送孙中山出境），或与孙中山背叛朝廷之行径大有关系。